邓小平的现代化观

□邓智平

8月22日上午，中共中央举行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必须继续深入学习运用邓小平理论，把他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中，围绕实现什么样的现代化、怎样实现现代化等问题作出了科学回答，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现代化观。邓小平的现代化观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化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实际出发，探索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建立百年以来，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所进行的一切奋斗，就是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中国成立以来，“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第十四个五年规划，一以贯之的主题就是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在“四个现代化”目标的指引下，我国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后期一些“左”的错误使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受到较大影响。

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一方面始终坚守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目标，他多次强调“四个现代化这个目标是毛主席、周总理在世时确定的”，并认为“在二十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是我国人民肩负的伟大历史使命”。另一方面，邓小平也深切地知道，1964年提出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目标时，还有36年的奋斗时间，但到了“文化大革命”结束时来实现这个目标，满打满算也只有24年。更何况，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耽误了我们很多时间”，要在“短短的20多年中实现四个现代化”，确实非常不容易。在这种情况下，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实事求是。

为此，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式的现代化”概念。1979年1月，邓小平提出要“搞出中国式的更好更新的东西”；同年3月21日，邓小平在会见英中文化协会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时，明确提出“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概念，他说，“我们定的目标是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的概念与西方不同，我姑且用个新说法，叫做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两天后的3月23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又把“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表述为“中国式的现代化”。1979年3月30日，他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中又指出，“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

邓小平在强调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的同时，也明确指出“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中国要谋求发展，摆脱贫穷和落后，就必须开放。”为此，中国积极学习和借鉴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并在开放中深化了对现代化的认识。如1978年10月，邓小平访问日本期间，在参观日产汽车公司时感慨道：“我懂得了什么是现代化。”中国坚持学习借鉴但不照搬，积极结合本国国情和实际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拿来为我所用变成“中国式”的，从而加速形成一条“合乎中国实际、能够快一点、省一点”的发展道路。

统筹兼顾，现代化建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民主法制、精神文明和党的建设并抓

现代化建设的内容涉及方方面面。邓小平对于现代化建设内容的认知并不是片面地局限于某个领域，而是包括经济、政治、精神文明等各个领域。

邓小平从回答社会主义的本质问题入手，阐明现代化建设的首要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他说，“坚持社会主义，首先要摆脱贫穷落后状态，大大发展生产力，体现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特点。”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给社会主义作出了最完整的定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在邓小平看来，中国式的现代化建设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

在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邓小平也指出，“我们的国家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我们要在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我们要在建立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此基础上，邓小平还形象地提出“两手抓”的思想，如“搞四个现代化一定要有两手，只有一手是不行的。所谓两手，即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我们现在搞两个文明建设，一是物质文明，一是精神文明”。

更为重要的是，邓小平非常强调党对中国现代化的领导和中国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性质。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谁来组织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谁来组织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对于坚持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性质，邓小平旗帜鲜明地说，“我们要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要有计划、有选择地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其他对我们有益的东西，但是我们决不学习和引进资本主义制度，决不学习和引进各种丑恶颓废的东西”。对于推进现代化过程中应该坚持什么，邓小平明确概括为“四项基本原则”：“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可见，在邓小平看来，中国式的现代化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

循序渐进，制定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三步走”的战略部署

对于什么时候实现现代化，即现代化战略目标问题，邓小平有着清醒的认识。首先，在目标设定上，邓小平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小康社会的建设目标。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正式用“小康”来界定20世纪末中国的现代化，他说，“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概念，而是‘小康之家’”。邓小平不仅从定性目标上把“中国式的现代化”界定为“小康之家”“小康水平”，而且还为小康设定“翻两番，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八百美元”的量化标准。

其次，关于目标何时实现的问题，邓小平认为，中国式的现代化不可能一蹴而就，只能采取渐进模式。于是，他提出了著名的“三步走”战略。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把“三步走”的发展战略构想确定下来，制定了从温饱到小康再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具体步骤，即：第一步，从1981年到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解决人民温饱问题；第二步，从1991年到20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人民生活水平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两番，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

邓小平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安排影响深远。世纪之交，党的十五大将邓小平提出的第三步战略目标进一步细分为三步，形成了“新三步走”战略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提出，“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重点突破，鼓励广东等地率先突破

邓小平认为，在人口多、底子薄的国情背景下推进现代化建设，必须在不平衡发展中实现平衡。一方面，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另一方面，共同富裕不可能同步实现，“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一些”，但这又不能让差距过大导致两极分化。

在实践中，为打破普遍落后的低水平均衡状态，党中央作出广东改革开放“先走一步”的重大决策，期望广东摸索出经验“杀出一条血路来”。广东以试办经济特区为突破口，抓住机遇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勇于突破计划经济体制束缚，率先探索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经验，形成了“全国看广东”的改革开放局面。凭借率先改革开放的优势，广东GDP总量从1989年开始就跃居全国第一（至今已延续35年）。在此基础上，1992年初，邓小平要求广东：“力争用二十年的时间赶上亚洲‘四小龙’。”他还特别叮嘱：“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显然，邓小平清楚地知道，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要让一部分地方先富裕起来，搞平均主义不行”；但“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所以先发展起来地区要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具体的“解决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作为先发地区的广东，也一直是这样做的。

总之，邓小平的现代化观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理论，丰富和深化了人们关于现代化理论的认知，是邓小平理论和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化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从道路选择的维度看，邓小平的现代化观强调走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从现代化建设领域的维度看，邓小平的现代化观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兼顾其他各方面内容；从目标达成的维度看，邓小平的现代化观强调分步走的战略安排；从推进方式的维度看，邓小平的现代化观强调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邓小平的现代化观还蕴含鲜明的方法论特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实事求是精神；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全面发展思想；循序渐进的目标达成方式；在不均衡中实现均衡的推进路径。

（作者是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改革开放与现代化研究所所长兼社会学与人口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邓小平关于发挥历史主动的思想与实践

□陈国忠 蒋积伟

历史主动是基于历史自觉与历史自信的现实规划与未来预判，是在准确把握历史规律、洞悉历史大势基础上的历史引领与历史创造。在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的进程中，邓小平关于历史主动的思想与实践始终贯穿其中，为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提供着精神动力与方向指引。习近平总书记曾对邓小平发挥历史主动的思想与实践作出过总结，他指出：“邓小平同志之所以能够为祖国和人民建立彪炳史册的功勋，就在于他看清了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大势，深刻了解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深沉愿望，把握住中国发展的历史规律，紧紧依靠党和人民建立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性伟业。”新时代新征程，汲取邓小平发挥历史主动的经验与智慧，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提升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

邓小平在中国革命进程中关于历史主动的思考与探索

历史主动是基于历史自觉的现实规划。青年邓小平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期间就明确了自身的学习规划与奋斗目标，彰显出为革命积蓄本领的历史担当意识与历史主动精神。邓小平指出：“我还觉得我们东方的青年，自由意志颇觉浓厚，而且思想行动亦很难系统化……所以，我来俄的志愿，尤其是要受铁的纪律的训练，共产主义的洗礼。”1929年9月，邓小平到达广西不久后，又立即投入到成立红七军、红八军的工作中，在此过程中邓小平不仅扩大了中国革命的政治影响力，更为中国革命积蓄了宝贵的武装力量。同时，邓小平在发挥历史主动的过程中又蕴含着自觉、审慎与严谨的思想态度。1930年1月，邓小平参加中央军委对广西红军工作布置讨论会时指出：“关于暴动的问题，我们很久就注意到了……不过必须有准备工作。因此，时间上并不能机械地确定。”这体现出邓小平发挥历史主动与坚持历史审慎并举的思想追求。

历史主动是基于历史经验与历史规律的未来预判，具有预估历史大局、预测历史形势的特点与优势。全面抗战爆发后，邓小平对国民党抗战意愿及全国抗战局势就曾作出预判。1937年7月22日，中共就红军改编与开赴前线等重要问题在陕北云阳镇召开红军高级干部会议，邓小平在会上指出：“对于卢沟桥事变，南京政府的态度是进步的，但仍是动摇的，不会配合全面抗战。前途有两个，一是通过抗战稳定战局，二是日军占领平津。后一种可能性更大。”此时，全面抗战爆发后尚不足二十日，邓小平不仅合理地估计出国民党的抗战态度及中日两国的战争演变态势，更诠释出国民党抗战态度与中国抗战走势的内在关联。与此同时，邓小平对中共抗战策略及战略方针的制定也提出了宝贵的建议。他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面批不抵抗倾向，一面发动第二步抗战。”这里不仅体现出邓小平的抗战决心与抗战策略，更彰显出邓小平发挥历史主动精神来预判未来、制定对策的思想智慧。

邓小平在中国革命进程中对历史主动的把握与发挥反映在革命实践中，突出地体现在对重大历史节点的捕捉与对历史跃迁的推动上。1947年8月，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千里跃进大别山。对此，邓小平就跃进的战略意义与跃进的时宜问题作出详细的阐释。他指出：“我们由黄河到长江跃进了一千里。这个跃进的意义可不要小看了……下剩不到一千里了，蒋介石的反动政权就要垮台了。”这里，邓小平阐释了千里跃进大别山对推动中国革命进程的战略意义。围绕跃进的时宜问题，邓小平亦作出恰当合理的说明，他表示，“事实证明，反攻是恰当其时的，迟了就要犯错误”。这里，邓小平通过阐释跃进的战略意义与跃进的适时性，实际上肯定了发挥历史主动思想来把握历史关键的合理性与应当性。

邓小平在中国建设进程中关于历史主动的把握与实践

在中国建设进程中，邓小平始终能够以主导历史前进的理性姿态明确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是经济建设。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避免阶级斗争路线的过度干预与教条主义的过多束缚，从而为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凝识聚势。1957年4月8日，邓小平在西安干部会上指出：“我们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任务，就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调动一切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而奋斗。”邓小平重提八大的任务与决议，一是肯定了八大方针政策的合理性，二是希望借助八大的政治权威与政治共识以更好地凝聚社会力量开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这有力地彰显出邓小平基于理性思维谋划经济建设的历史主动思想。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提出：“不只是当前，恐怕今后长期的工作重点都要放在经济工作上面。”此后，历史与实践亦充分证明，邓小平发挥历史主动精神推动经济发展的思考与实践，是符合社会主义本质要求与中国人民切身利益的。

历史主动是在遵循历史发展规律、洞悉历史大势基础上的历史引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基于国内外建设实践，以引领历史潮流的战略智慧标注出社会主义现代化“三步走”的建设步骤，为后续我们党明确并完善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步骤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引领与经验借鉴。20世纪70年代以后，邓小平以敏锐的战略眼光发现，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摆在我们面前的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如果我们不能抓住机遇、接受挑战，就要落后于历史的潮流，被历史所抛弃。而亚洲“四小龙”及战后日本的快速发展又为邓小平发挥历史主动精神制定“三步走”的经济发展战略提供了历史与实践的依据。邓小平基于历史经验，但又不拘泥于历史模板的做法，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三步走”发展战略迈上历史潮头、引领历史潮流提供了国际支撑与历史依托。

历史主动是打破历史枷锁，积极求新求变的历史创造。发扬历史主动精神，打破历史枷锁与桎梏，将“一国两制”确立为国家统一的制度方式，是邓小平在中国建设进程中发挥历史主动性的有效彰显。囿于革命战争经验的思维惯性及意识形态的对立斗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更多的思考与实践是依靠革命式的军事斗争通过消灭制度、政权及军事力量的对立来实现祖国的统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两种制度是可以允许的”等思想观点。此外，邓小平不仅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的制度构想，更基于中国的现实国情，将“一国两制”的制度运用于香港、澳门的回归实践中。这不仅摆脱了一个国家一种制度的思想束缚，更为祖国的统一大业奠定了坚实且持久的制度根基。

邓小平在中国改革进程中关于历史主动的思索与争取

发扬历史主动精神、掌握历史主动权，需要坚持正确的方法与路径。守正创新是邓小平发挥历史主动性的基本路径与方法。在改革进程中发挥历史主动，尤其要把握好原则、立场等方向性问题，否则极易将历史主动变为历史臆动与历史冒进。邓小平坚持在守正创新中发挥历史主动思想，极大程度地避免了主观臆断与盲动冒进的不良倾向。守正，就是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社会主义的性质与方向。创新，是结合时代特征与时代需求，以敢为人先的精神智慧摸索新做法、探索新模式，从而引领历史、创造历史。邓小平在中国改革进程中发挥历史主动性，十分注重激发创新的元素价值，以创新彰显主动。兴办经济特区、实施股份制、设立证券交易所，这些都是创新的体现，更是邓小平发挥历史主动性的实践结果。守正继承历史，创新彰显主动。基于守正创新的方法与路径，邓小平发挥历史主动性推动改革进程变得十分稳健且成熟。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战略上赢得主动，党和人民事业就大有希望。”战略思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重要思维方式，同时，也是邓小平赢得历史主动的主要方法。1979年10月，邓小平在论及经济调整与经济改革问题时指出：“我们要瞻前顾后，看远一点”“我们搞计划、考虑问题，面要宽一点，要照顾到三年以后。”邓小平以未来需求为目标，这就为他下好先手棋、赢得主动性提供了先机与可能。1980年4月，邓小平在会见世界银行行长麦克纳马拉时又指出：“对我们中国来说，考虑问题历来不从中国自身利益一个角度考虑，而是从全球战略来提出问题、考虑问题的。”基于全球战略来思考中国问题，这就为邓小平以战略思维赢得历史主动提供了世界智慧与国际参照。邓小平着眼未来、关注全局的思考与规划，不仅有力地勾勒出战略思维的内涵要义，更增加了邓小平以战略思维赢得历史主动的合理性与可能性。

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才能发扬历史主动精神。改革开放初期，教条化的“左”倾思潮排斥改革开放并反对中国发展市场经济，西方自由主义思潮则主张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全面实行西方资本主义制度。邓小平认为“这两种思潮都是违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对此，我们绝不能放任自流，必须与其进行坚决斗争。邓小平对上述两种社会思潮的分析与回应，实则是在以敢于斗争的历史主动精神坚持中国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与方向。此外，邓小平还将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优良作风，运用于党的建设之中，尤其是反腐败工作领域。1982年4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我们自从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两个方面的政策以来，不过一两年时间，就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了。”为此，邓小平提出：“打击经济犯罪活动的斗争……这是一个经常的斗争，经常的工作。”邓小平将反腐败斗争作为党的建设的经常性工作，是他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重要体现。

（作者陈国忠是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蒋积伟是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四新』向度

□彭未名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为顺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指明了方向。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辟中国式现代化广阔前景，高质量发展是首要任务，高质量发展依赖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新质生产力催生新动能，新动能促进形成新优势，新动能、新优势塑造与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新体制。

一、新质生产力

新质生产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动力源泉。必须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决定》强调，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以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为特征的生产力。这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指明了方向和路径；《决定》还要求，聚焦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完善收入分配和就业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增强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可以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为强大的主体力量。

二、新动能

新质生产力催生新动能。新动能涵盖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形成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动力、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新动能从新质生产力的创新发展中来，需要通过加大研发投入、建设创新型国家、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和应用等创新驱动措施，加以培育和壮大。新动能带来高质量发展，必须完善推动高质量发展激励约束机制，塑造发展新优势。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在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方面的突破，以催生新产业、新模式和新动能；注重产业结构优化，从传统制造业向高附加值、高新技术领域转型。

新时代以来，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蓬勃发展，绿色低碳投入不断增加，绿色产业强势崛起，这些变化促使中国经济在遭遇挑战时仍能保持稳定发展。此外，消费成为经济增长主引擎、新动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攀升，投资流向和结构不断优化，资金重点投向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长远发展的重点领域，实现了投资对宏观经济的积极影响。新市场主体、新产业和新产品的较快增长，新业态新模式的成长壮大，反映了中国经济创新动能的持续增强，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点和着力点，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能。

三、新优势

新动能促进形成新优势。新优势包括新的技术优势、新的产业链供应链优势，以及新的分配优势。新质生产力中的创新能力，可以帮助企业开发新产品、新技术，从而在市场上获得竞争优势；通过优化产业链，提升产业链的整体竞争力，包括提升产业链的附加值、加强上下游企业之间的协同创新等，形成经济增长新优势；新质生产力强调人才和知识资本的重要性，通过培养和吸引高素质人才，企业可以更好地利用新理念和新技术，推动形成发展新动能；同时，绿色生产带来新优势，随着全球对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视，新质生产力中的绿色低碳技术成为新优势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采用环保的生产方式，企业满足市场需求的同时降低对环境的负面影响；此外，分配优势将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势，我国继续推动实现共同富裕，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和兜底性民生建设，解决好老百姓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让老百姓从经济增长中获益更多，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深化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奠定坚实基础。

四、新体制

新动能、新优势塑造与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新体制。新动能推动体制创新，如，科技创新、数字经济等需要与之匹配的知识产权保护、科研经费支持、人才引进和培养等制度安排，这些需要推动政府对相关体制进行创新和改革，以适应新动能的发展需要。新动能促进形成新优势，新优势引导体制调整。随着新动能的发展，新的竞争优势逐渐形成，这些优势可能来自于某个行业或领域的快速发展，如绿色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为了保护和扩大这些优势，政府需要调整现有的经济体制，比如优化税收政策、改善监管环境、加强国际合作等，以更好地支持这些新优势的发展。此外，通过深化经济体制、科技体制等改革，加快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建立高标准市场体系，着力破除各种形式的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让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顺畅流动。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通过与时俱进地深化改革开放，坚持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充分激发各类主体的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当新体制形成后，就会反过来为新动能和新优势的发展提供更好的环境和条件。如，一个更加开放和透明的市场环境可以吸引更多的投资和创新，从而促进新动能的发展；一个更加有效的监管体系可以确保新优势的可持续性和公平性。

（作者是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省社会组织研究中心教授）

注：本文系广东省社科规划2023年度高质量发展主题研究专项“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根本要求，持续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GD23WTD03-05）研究成果。